

## 一、概 述

### 1. 世界宗教进入改革时代

15、16 世纪是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过渡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欧洲先后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德国农民战争、民族国家兴起等伟大运动，表明新兴力量突破了旧制度的束缚，展现出近代文明之魅力。中世纪的政治、社会、权力、财产、法律、道德结构虽然仍旧存在，但已经是强弩之末。

世界宗教领域也发生深刻变化，最明显的是体现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宗教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有机系统和文化现象，其中有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要素，也有组织机构、教规戒律、崇拜礼仪等社会行为要素。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宗教结构发生改变。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首先爆发决非偶然，重要原因之一是封建主义在欧洲已经明显衰弱。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灭掉了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这一事件反映出了西方封建势力之衰弱无力。无论是罗马教皇，还是各国的君主们，都无力抵制土耳其人在欧洲的扩张。欧洲又是城市、工商业和市民文化比较发展的地方，注重仪式、原罪和教皇世界帝

国的中世纪天主教显得不合时宜。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下，中世纪天主教向注重精神、信仰和民族化的基督教过渡。路德、加尔文、慈温利等宗教改革的理想，使新的宗教同社会发展的潮流开始合拍。罗马教廷一统天下的梦想从此宣告破灭。

### (1) 民族教会的呼声

15、16 世纪，欧洲各国教会民族化的呼声很高。西欧君主制度的强大，不可避免地与罗马教会发生冲突。教皇推行世界基督教王国，力图把世界控制在自己手里。但至近代前期，君主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各国的僧侣开始倒向君主一边。围绕着由谁来执掌教务和管理世俗事务的问题，王权和教权展开了斗争。中世纪封建制度盛行之时，教皇的开除出教的敕令往往具有威胁作用，现在国王的权势已经十分巩固，这种开除出教的威胁不能再把国王怎样。宗教改革运动后，无论是新教国家，还是天主教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

英国在君主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英国国教。英国国教在教义上同天主教没有多大差异，但英国的教会从此就脱离了罗马教会的控制。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虽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但在国王斐迪南时，西班牙政府也已控制了教会。教皇英诺森八世需要西班牙支持他在意大利的政策，在 1486 年曾颁布教皇敕令，规定西班牙的君主有权在王国的一切新建地区委任神职人员。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以这个文件为基础，把委任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西班牙教会神职人员。在司法和财政上，斐迪南也控制了宗教司法机构，使它们对国王负责，而不必通过罗马教会。西班牙政府向教会征收特别税，把教会财产转变成国王私产，1523 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从教皇艾德里安六世那里得到了

委任西班牙主教的权力。在新建立的西班牙海外殖民地中 西班牙的君主更具有完全的控制权 自 1508年起国王就可以委任那里的一切教职。

宗教改革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首先爆发，接着传播至瑞士、英国、法国等地 进而转变为一个全欧性运动。各地的宗教改革，一般都经历了神学争论、建立新教领地和向外传播三个阶段。宗教改革过程中 还穿插了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和 各种政治力量以宗教纠纷为借口进行的宗教战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 对异己派教徒的宗教迫害。这一切说明即使在宗教领域 从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过渡的历程也是十分艰难曲折的。

宗教改革运动引起了世界宗教格局的变化。在神圣罗马帝国和瑞士 出现了新教区和天主教区的混合状态 而新教本身又分为若干教会，如慈温利派教会、加尔文派教会和路德派教会等。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仍然属于罗马天主教势力范围 虽然各国内部仍然有各种宗教改革风波。荷兰属于新教国家。英国也是新教国家 奉行英国国教 具有独立的性质 虽不隶属于罗马教会 但国教的教义、仪式等方面又同天主教很相似。西班牙、葡萄牙通过殖民所建立的海外帝国 基本上随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继续信奉罗马天主教。在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后 罗马教廷还在印度建立了果阿教区，来统辖海外殖民地和亚洲的教会。

## (2) 伊斯兰教文明和佛教文明

近代前期是伊斯兰教文明继续昌盛的时期。在欧洲的东部和地中海地区 出现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伊朗的萨菲帝国一起，成为伊斯兰教三大帝

国。近代前期的伊斯兰教中也出现了各种改革，变化趋势是伊斯兰教同政府进一步密切结合，宗教和政治之间的矛盾状况却有所缓和。这一时期还是伊斯兰教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很大。在下层穆斯林中间，出现同正统派伊斯兰教会不尽一致的各种教派。伊斯兰教在一些被征服的地区，还同当地的文明和文化进行融合，互相影响。

伊斯兰教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不同的民族联合在一起。11 世纪时，阿拉伯语已经取代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阿拉米语，在从摩洛哥到波斯的广大地区盛行，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说阿拉伯语的人，都存在着一种相同的感情，伊斯兰教不仅是信仰，还是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体系和制度并且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在伊斯兰教传播地区就出现与伊斯兰教文明相联系的宗教、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在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中，也开始同其他文明进行融合，吸收了基督教、犹太教地区的行政、科学和文化精华，从而更加增进了自己的力量。

在伊斯兰教国家里，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具有融合其他优秀文明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特点。在伊斯兰教的学校中除了学习《古兰经》、《圣训》之外还专有学者研究希腊、波斯的科学和文化。伊斯兰教徒在纸的制造、指南针的使用及数学、医学等研究方面，都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当西方人仍然习惯于用笨拙的罗马数字进行计算时，阿拉伯的简便数字已经完善，并且传到了西欧。

西班牙是伊斯兰教文明和西欧基督教文明主要的交触地点。那里的伊斯兰教徒称摩尔人。伊斯兰教徒的贡献很大，他们介绍进西班牙大米、蔗糖和其他的东方农作物，建造大规模的土

地灌溉工程，开发和冶炼金、银和其他的金属矿藏，从事丝织品和毛织品的制造，还传进玻璃、写字纸张、皮革等的制造方法。西班牙的塞维尔成为重要商业中心，输出商品有无花果、酒、糖等，先运至非洲、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然后从这几处地方运至印度和中亚地区。塞维尔港口停满了从欧、亚各地来的商船，载来埃及的布匹、奴隶和歌女。此外，摩尔人的文化程度较高，大多数能够读书写字。12、13世纪，西班牙穆斯林的托莱多城，已成为一大学术研究中心，在这里从事翻译和学术研究的，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从欧洲各地来的外国学者。这一活动使西欧得以同希腊哲学重新接触，为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文化基础。

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对西欧影响很大，但是由于宗教和政治的原因，西班牙也是一个时常发生宗教冲突的地方。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西班牙统治者，在15、16世纪加紧对摩尔人的驱逐和压迫，但是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交往，仍然保持着。

近代前期，佛教在印度走向衰弱，但在中国、日本等地却有所发展。此外，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后，西方的新教和罗马天主教都派遣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去美洲和亚洲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中国各地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种新的世界宗教格局，对以后的世界宗教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2. 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

### (1) 罗马教会解释的基督教教义

作为一种宗教，基督教的核心是一种对上帝的精神信仰。它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上帝、耶稣和圣灵），神不仅是人和世界的创造者，还具有对自然界、对世界和对人类的具体的影响力（神

意)神的意志和耶稣的活动 都记载在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特别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部福音书对耶稣事迹的记载)《圣经》因此是至高无上的 为基督教的重要依据。

中世纪晚期,罗马教会继续强调人的原罪,宣扬基督徒生活可以使人重新得救,从一个罪人转变为一个基督徒。这个过程被说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合作:人奉行善功,上帝给予人以帮助。善功在摆脱原罪和得救方面被认为是绝对重要的,宗教仪式和行善是积累善功的主要途径。这种灵魂得救的途径,就被称为皈依、修练或“行为称义”。

“行为称义”是集体性和经验性的,需要依赖于特定的教义、仪式和组织。它强调《圣经》和传统 传统就是罗马教皇的许多敕令、他们对《圣经》的注解、教会的法律、圣徒的生活和经院主义的神学理论。中世纪后期特别注重传统中的教会规章制度,这种倾向有把信仰的中心从上帝那里转移到教会那里的危险。这似乎偏离了信仰论和神救论,提高了教会组织的作用。信仰论主张把宗教看作一种信仰的活动,而不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对上帝应该是信仰崇拜,不是对上帝进行解释。上帝是永恒的、智慧和的一切美的创造者,所以上帝具有原动的特性,人间的智慧只是被动的 是神意的授予。这样 上帝、耶稣、人和人的罪恶就组成一种复杂的关系 上帝是创造者 或者是“创造者的创造者”这种创造活动是连续的,永久的,包括宇宙、人类如何围绕神意而运转。耶稣基督是上帝心爱的圣子,他具有救世主的含义,因为他以一种肉体受罚的经验过程完成一种精神性的人类原罪洗涤的复杂工作,并通过向人类传道,向人类展示一种基督徒的生活,使人类回归上帝。耶稣基督因此是救世主,通过他的拯救,那些负有原罪的人们才能重新回到神的身边,重新加入神的世界改

造工程。

“行为称义”的观点，过分强调了人的特殊性和自由度。按照罗马教会的解释，神是根据自己的样子来创造人类的，所以人不同于其他物种，他具有理性、道德性、自由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信仰论认为这种自由意志最难掌握，如果误解和滥用，就会堕入罪行之中，这是人类获得原罪，被赶出伊甸园的原因。行为论和信仰论因此对立，后者主张放弃人的自由度。罗马教会倾向于承认这种自由度，但又认为这种自由度不是掌握在个别基督徒那里，而是掌握在教会手中：必须通过教会才能使人进入道德生活和基督徒生活。在中世纪后期，真正具有自由的不是个别的基督徒，而是掌握教会大权的罗马教廷。罗马教会把基督徒的自由度，简化为是服从教会还是拒绝服从教会。如果服从，就是好的基督徒。如果对教会规则不够恭敬，就成了宗教异端。宗教异端不同于异教徒，它是指非正统的、错误的基督徒，罗马教会对他们采取了镇压态度。异教徒指的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们，如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徒。这样，中世纪后期的罗马教会就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一种中介机构，人必须得到教会的批准才能进入天国。这就是所谓“教皇掌管进入天国的钥匙”的说法。

## （2）中世纪后期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和教仪

中世纪时，教会建立了同世俗政权十分相似的教会等级制度。由教皇为首的罗马教廷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统领。历史上罗马的教皇原来只是古代基督教会在罗马、耶路撒冷、安提克、亚里山大利亚和君士坦丁堡的五大主教之一，只是因为罗马城曾是罗马帝国的首都，故而使罗马主教的声望权力日益盖过其他的主教们。历代罗马主教一直追求宗教权力和法律权力，自

称是西方教会的领袖 并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在教皇利奥一世（公元 440—461 年）的时候，主教成了教皇，并正式成为西方基督教的领袖。476 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方的基督教会就由罗马教皇来统领。

为了管辖教会的地方事务，教会在有基督徒生活的地方（中世纪的天主教基督徒主要是在西欧、中欧和北欧）建立了省区、主教区和教区。这起源于罗马的传统。罗马帝国时，在各个大的城市设有总督，往往管辖一个行省中的许多城市和地区。在总督之下有各级地方官员，他们的驻地也往往在中等的城市。与此相适应，教会在各个大城市中，也设立大主教辖区。省区系一较大的区域，以一重要城市为中心，受大主教的统辖。主教区系省区的一部，包括一市镇或一城邑，连带四周的乡村，受主教的统辖。教区则从主教区中划出，通常只有一个教堂和到教堂集会的人们所住的村落，或城邑的一部分。每一个教区里面有一位神父，主持弥撒礼和种种圣礼。在重要的教区内，也许会有副神父和会吏。这些教士——大主教、主教、神父和会吏——合在一起 称为教职团或世俗的教士。他们有世俗的称谓，是因为他们在世俗社会居住和工作的缘故。这样的一种教会体系，渐渐遍布了欧洲各地。他们服从上级教会的领导，最后的权力集中于罗马教皇。

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清修教士或隐修教士 包括修道士、托钵僧和女修道士。他们脱离世俗社会 按照宗教的清规过活。中世纪的修道士教会有好几个派别。

本尼狄克特派的修士和修女住在某个修道院里，通常拥有大农庄和地产，遵守第六世纪本尼狄克特所定下的教规。僧侣耕种土地，抄录书本，管理学校和慈善机关。大多数的本尼狄克特派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是独立的团体，每院由自己的主持统辖，

主持除忠顺教皇外，不属于任何其他人。但是克吕尼的本尼迪克特修士则联合为一个团体，由一个机构统一加以统辖。

在 11 世纪时兴起了骑士团。骑士团是依据军事标准组成的，它追随于十字军之后，照料生病和受伤的士卒，以及卫护与基督一生有关的圣地。这个团体中又分出神庙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

托钵僧或称乞食团，起初没有定居，随处漂泊，向民众传授教义，依赖于人们的周济布施得以生活。13 世纪以后渐渐兴盛，包括：一、法兰西斯派或小托钵僧团，它的创造人为阿西济的法兰西斯（1182—1226 年），其主要的活动是提倡谦虚精神，以爱护贫穷人民来劝说世人；二、多米尼克派或布道团，由注重实际的多米尼克 1170—1221 年创建，主要从事传教事业。

中世纪后期，教会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人们宗教生活，它指导宗教的仪式，执行各种圣礼，并且努力促进教徒的信仰。封建制度兴起后对教会产生影响。教会卷入政治漩涡，在教育、司法等方面执行了世俗职能。中世纪的基督教因此带有封建意识的成份。它教导穷人和富人之间差别的形成是一种天意，教徒应该服从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统治。虽然教会的利益同世俗封建主的利益有所不同，但教会渐渐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号召力和世俗的权力，如教皇能够调动教徒们进行十字军的东侵。教会还对善功进行解释，把参加弥撒、为教会捐款、朝圣等都说成是善功的具体表现。

为了突出教会的神圣作用，教会开始强调宗教仪式在得救中的作用。根据通俗的理解，仪式具有豁免人的罪行的作用，意味着教会的神职人员，如教皇、主教和教区的神父，都具有举行圣仪、洗涤人类罪行的能力。仪式有很多种，最主要的是洗礼、坚

信礼、忏悔礼、圣餐礼、临终涂油礼、圣职礼和婚礼七圣礼。洗礼是诵读某种经文，用水洗净一个儿童的原罪（指亚当遗下的罪）和以前所有的罪，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上帝的后裔和上天的子孙。洗礼通常由神父执行。坚信礼通常由主教给青年涂油，付以圣灵，使他们成为成熟而健全的基督徒。忏悔礼是特别重要的圣礼，它的作用是解除在洗礼后所犯的罪恶。要想得到这种忏悔圣礼，这个教徒必须追问自己的良心，忏悔自己的罪恶，决定不再冒犯上帝，向神父口述自己的极大罪恶，由神父解除其罪行。履行神父所制定的特殊的悔罪苦行，如朝拜教堂、祈祷或赈济等。圣餐礼是用供神用的酒和面包，因神父或主教的语言，神奇地变成基督的血和肉体，为信徒共同所接受。“弥撒”的意思就是指圣餐祭礼的完成。这个词的拉丁语原意就是“好！已经完成了！”由教会中的神职人员在圣餐礼完毕时喊出，后来引伸为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临终涂油礼是神父们用圣油涂在将死的信徒身上，加强力量，使他很快的复原，或快乐地死去。圣职礼包括主教委任神父或教堂其他神职人员，赐与他们神力和权威，去履行他们的神圣的职务。婚礼是男女自己在基督教婚礼下结合的圣礼，经此圣礼后，婚姻就非人力可以解除。这样，宗教仪式就渗透到人的生活的每个重要时刻，紧紧地束缚了人的思想和活动，使人的一切都要服从教会。不参加圣仪的人被认为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们，在中世纪的欧洲很容易受到非难，这样，教会的势力就膨胀起来。

与教会崇拜相联系的是对善功的强调。善功就是做好事，它却使基督徒精神化的生活变得世俗化。人们很容易认为只要做好事，就能灵魂得救。然而，什么是好事，标准又掌握在罗马教廷那里。教皇宣布十字军征战是一种善功，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也

是一种善功。这样，对善功的解释，就紧紧地同罗马教会的世俗利益联系了起来。罗马教会发明了功和过的标准，利用这些功过格来确定谁能够进入天堂，谁不能进入天堂。人类的过失就是人的堕落，被解释为是魔鬼的作用。所以，人的生活成为一种考验，如果教会认为是功大于过，说明人相信的是上帝，这样就可以免遭地狱之灾，进入天国福地。可见这种善功说是突出教会的权威，成为其控制基督徒来满足基督教会利益的一种手段。

为了使人们相信教会的神性，教会提出了许多禁欲主义的主张。例如，神职人员不能结婚，僧侣们需要有特定的训练，有拉丁语基础及讲解《圣经》和举行圣仪的能力。只有这样，才显得僧侣同世俗之人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做法使得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分为圣俗两界，后者的精神和行为实际上是受前者控制的。

中世纪后期，罗马教会竭尽全力来建立大一统的基督教王国，罗马教廷企图把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各个国家的主权之上。在中世纪封建割据状态时，各国的主权问题比较模糊，国家的地域原则和民族心理尚未健全，所以教会有可能发展它的世界教会王国的计划。在近代前期，这种做法就受到世俗统治者的反抗。另一个基本的趋势是教廷的世俗化，教廷要求每个僧侣过禁欲生活来提高教会的威望，但教廷本身却十分世俗，不仅拥有了大量的财产，还建立了法庭、军队和税收。在意大利的罗马还建立了教皇国。这样，上层和下层僧侣之间，宗教理论和教会实践之间，僧侣和俗人之间，就产生尖锐的矛盾。在近代前期，这种矛盾变得无法调和，一方面，人民普遍不满教会的世俗化，另一方面，王权强大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导致了王权和教权之争。这样，无论是在信仰问题上还是在政治结构问题上，教会都陷入了危机。罗马教会再也无法和平地保住它的权威。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

终于把这一切挑明了，使得各种矛盾公开显现。所有这些，构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大背景。

### 3. 宗教改革时代的背景：资本主义兴起

15、16 世纪，世界宗教进入改革时代不是出于偶然，这同封建主义的衰落、资本主义兴起有着直接联系。从 14 世纪起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开始称自己的时代为“黄金时代”。学术和科学蓬勃发展，令人们对近代文明的晨曦充满赞美之情。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农民战争、海外探险和殖民运动似乎要向人们证明：新兴变革力量正在中世纪的母体中不安地骚动，尽管中世纪的旧秩序 权力结构、财产结构、法律规范、道德体系和宗教制度仍然存在，但已缺乏强有力的利爪和凶猛力量，可以用来消除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各方面的危机。封建主义表现出各种衰败的症状。封君封臣关系只停留在名义上，对封建主的忠诚已经消失。基督教会依然存在，但教会本身的纯洁性和教会在灵魂得救中的神圣作用已被普遍怀疑。贵族的封号仍然受到尊敬，但其权力、职业、谱系、特权、财产已不再具备严格的等级规定性。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制度蓬勃兴起，在经济上货币商品关系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开始产生。在政治上近代民族国家不断出现。简言之这个时期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已经处在新旧社会交替的门槛上。能否跨越这个门槛，进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关键要看能否有一种替补的力量，用来修补或取代已经衰败了的封建秩序。

这个时期明显的社会特征，是新的社会结构在蓬勃兴起，但各种旧的利益集团都无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要把社会引向较

有发展前途的近代文明，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当时比较流行的词汇如“复兴”、“改革”、“公正”、“神法”，“基督教之爱”等，包含着惊叹社会衰败，企图寻找振兴社会新元素的心态。这种复兴计划，本质是撇开旧的腐败体制，在其之外发展新的社会机制。大约从 14 世纪起，这项工作变得极为重要和富有创新精神，使得制度方面出现多种结构。在政治制度方面，重要的有帝国制、君主制、等级议会制、城市共和国、诸侯公国模式、诸侯领地等。宗教领域有多种神学理论和教会组织。在经济方面，农业、商业、工业和海外事业齐头并举，经营方面包括了从再版农奴制到资本主义经营一系列相当不同的模式。在人口、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出现了社会分化。这些发展，现在看来是极富魅力的，因为在这种丰富多彩的创造活动中，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秩序和事物内在的合理性。在追溯欧洲近代化的过程时，一种深切的感受就是：我们开始面对一个复杂的、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在于：如何从这些众多的结构中，寻找出欧洲文明发展的动因？

15、16 世纪，是西欧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意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封建领主、附庸政治制度的衰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主教会的危机和改革，农村社会秩序的调整，这一切都表明一个转折时代的到来。这个转折时代的特征，必然是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机会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带来忧虑和不稳定。这个过渡时期中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寻找一种出路，各个阶层都在为自己将来的利益奋战。政治方面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封建制度衰退、中央化的君主政府兴起和社区化运动高涨。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央化、官僚化的政府的发展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它制造出国家和臣民的关系，用以取代封臣制、贵族割据、社区自治和“罗马教会世界王国”。这样的发展需要国家从私家政治向关心公共利

益的公共政府转化，虽然这种转化对君主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二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即 15、16 世纪的社区主义运动，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自我保护和联合，发展出新的“普通人”的合作机制，用以抵制国家和贵族的侵占。这一种自下而上地推进政治改革的企图不容忽视，因为它虽然不是政治近代化的起点，却是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基础。

正在衰败着的封建秩序，决无力量把人们从焦急、混乱中拯救出来。15、16 世纪，贵族和君主的斗争削弱了政治上的统一，彻底较断了建立在封君封臣关系上的传统封建契约关系。贵族从 13 世纪起就曾制订各种法规，限制君权的扩张。他们现在认真对抗君主势力，不再像以往那样忠诚地为封君效忠。骑士的失落感最大，他们公开起来叛乱，成为一种社会动荡的因素。国王必须依靠雇佣军才能维持，他们个人的威望、封君关系已经不足以保证自己的政治权威。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围绕着争夺政权和财产展开激烈角逐，时有诸侯领地被侵夺，时有公爵被赶跑，时有贵族流浪国外。

经济上同样发生巨大变革。商业化的浪潮向四处卷去，所到之处，贵族被迫改变经营方式，僧侣也开始进行商业投机，农民的生活开始围绕着价格而上下波动。城乡关系不是缓和而是激化了，穷人大批出现。商品化的浪潮刺激欧洲人进行海外探险，企图依靠对海外民族的掠夺来积累工商业发展亟需的资本。欧洲各地的贸易市场和世界贸易市场蓬勃兴起，刺激着商品化的农业和手工业崛起。农村经济和城市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涉及到许多人的生活、盼望和命运。这时，我们还看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如城市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方面的调整无疑给西欧社会注入活力，使欧洲经济找到一条出路。人的生活也发生变

化，最引人注目的是统治者对人民加剧剥削，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之间又出现新的不平衡性。

贫富分化在加强，富人们联成一个富人贵族阶级，而城市平民、农民也联合了起来，组成普通人的阵营。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的冲击对以往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大改组。僧侣、贵族、农民这三种基本的封建等级失去了自己的等级规定性，等级关系向阶级关系过渡。富人、有权者组成了权威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了“普通人”的阵营。在普通人之下还有一个为数巨大的穷人阶层，穷人向四面八方涌来涌去，出现流民潮。穷人阶层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力价格低下，富人变得更富，穷人无立锥之地。

生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大动荡之中的人们，普遍感到信仰危机和不安全感。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一再告诫家人，不要在大街上谈论时事，免得遭到不测。在欧洲的中部出现了对死神的崇拜，死神舞蹈的宣传木刻画比比皆是。在意大利距罗马城并不太远的地方，一些人在深夜之中没命地奔跑，他们是一些男巫，自以为在保护庄稼、在为人类的利益同魔鬼进行坚持不懈的夜之战，直到罗马教会的宗教裁判所把他们当做异端而处以死刑。人文主义的思想家渴望通过教育来恢复人间的道德，而另外的一些人如马基雅维里和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则对人间的罪恶不再抱有幻想，前者正式宣布人性是邪恶的，后者把希望寄托于同冥冥天国中的基督的神秘交往。无论是僧侣还是俗人，都在盼望一种新的法律和道德秩序，正如他们盼望一种良好的宗教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商人们现在却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握有巨大的金钱和强大的政权。在城

市中，城市贵族控制一切，他们精心选择如何用金钱换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把子女送去经商或上学，后者直接进入教会和政府的核心部门，成为一代新贵。商人们和君主、贵族合作，开始在等级会议或政府内阁中有了发言权。商人们可以用金钱换得贵族的称号，可以用金钱购得土地，可以任意控制物价，可以用高利贷不顾道义地剥削平民百姓。商人的行为遭到贵族世家的不齿和广大农民的痛恨，但大家对他们又无可奈何。贵族要向商人们借贷，农民们的生计在某种程度上正受着商人的控制。一种新的对立关系正在形成。

这一时期，基督教和教会起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罗马教廷的危机、福音运动和《圣经》主义、僧侣的宗教改革和农民、市民、贵族、国王的宗教改革。一是神学方面的问题，如什么是基督教的新基础，教会的权威如何回归“纯粹的上帝之言”。二是教会的组织问题：物质的、世俗化了的教会如何向精神的、不可见的教会过渡。国王、诸侯、城市和乡村也有实现教会国家化、地区化、社区化的企图，希望把教会掌握在自己手里。宗教改革家企图把教会的世俗成份还给世俗的政治权威，希望宗教能脱离世俗权力，找到与新时代的社会体制共存在的新基础。

这一时期文化上的成就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人们获得了新的文化和新的思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对社会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可以归结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人文主义思想不仅在意大利地区促进了文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发展，更在中欧和瑞士同加尔文、慈温利派的宗教改革有所交叉，成为社会改革的推动力。从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救国的计划到慈温利、加尔文和闵采尔等人的宗教改革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联系，但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出身的僧侣路德又另当别论。路德

视自己的理论为“精神性”的，批判农民企图把他的理论“物欲化”。农民也提出了自己的基督教理论，把神学解释为众人平等，认为神法可促进公共利益、基督教兄弟之爱。农民基督教无疑是一种新的信仰，通过用神之法取代古之法，农民找到一种强化社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人文主义同宗教改革之间的复杂联系，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实在的、非神秘的联系，都证明这一时代人们在文化上、政治思想上有所建树。

15、16 世纪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流行，出现了廉价书籍。印刷术在中国公元 5 世纪就已发明，而西欧习惯于雕版印刷，所以成本很高。在 15 世纪时，一个金匠约翰·古登堡首次在西欧采用活字印刷。活字印刷代替雕版印刷，它可以连续使用，成本很低。弗兰西斯·培根说这是三大伟大发明之一，它们（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变了世界各国处境。印刷在教育、宣传和扫除文盲中起重要作用。活字印刷在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西欧同传统的农业社会告别。印刷的作用是传播知识和新的概念，这样就抵制了中世纪时代的封闭和孤陋寡闻。这种新技术使得书籍印数剧增。过去印一本《圣经》需要 10—15 年的抄写时间。历史学家指出，在采用活字印刷以后的 50 年中，印刷的图书量等于欧洲过去几千年所有的图书总量。从书籍的内容看，在 1589 年巴黎出版的 169 本书中，有 32% 是文学作品，29% 是宗教，16% 是历史，13% 是艺术和科学。在 1645 年出版的 456 本书中，38% 是宗教，24% 是文学，18% 是历史，7% 是科学。这两项加在一起，有 1/3 的书是关于宗教方面的。书籍每版的印数，一般是 1250—1500 本，而且主要是用拉丁文写的，不过民族语言也在发展。1564 到 1600 年，法兰克福图书市场共有 15000 本德国出版的书籍，其中有 1/3 是德文写的。在 1601—1605 年的 1334 本